

理论传播要能言善言

□ 杨正权

渴”，催人奋进。

马克思指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怎么说话”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逻辑问题，更是一个周到细腻的情商检验问题。党的理论本来就是有温度的，是有血有肉、充满关怀的，不是冰冷僵硬、空洞乏味的。高高在上的说教，只会让理论远离群众。追求有深度、有情怀、有意思的表达，说理又陈情，寓情于理、情理交融，让听众听得懂、愿意听、喜欢听，才是打通理论宣传“最后一公里”的诀窍。

言之有物 提升理论传播渗透力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学风，也是理论传播的根本原则，是所有一切理论宣传形式载体的生命力之所在。只有坚持联系实际，言之切切，言之有物，理论才能落地生根，也才有实际意义。

内容永远是根本。现实生活 and 现实的人，才是理论传播最丰富的矿藏、最鲜活的素材。党的理论和各项政策必须与实际问题相联系，才能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长期以来，理论传播的一个“痛点”就是内容与现实脱节，导致“听者不爱、说者无奈”。问题是理论传播的“魂”，人们常常把一些理论文章形容为空洞的、虚无的、没有意义的一堆文字，提不起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理论文章讲的是“正确的废话”“无用的真理”，没有针对问题，没有“魂”。远离问题的理论必然为人们所远离。言之有理、言之有物的理论，给人以启迪和引导，帮助人们明辨是非、澄清模糊认识，自然为人们所喜欢。邓小平指出：“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理论传播者必须不断增强了解大局的意识，提高认识大局的能力，方能用有思想、有筋骨、有温度的高品质内容观照现实、回应关切。

实践之树常青。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应接不暇，理论传播要时时刻刻强化问题意识，围绕治国理政的战略问题、广大群众关心的现实问题、国内外发生的热点问题，找准思想认识的共同点、情感交流的共鸣点、利益关系的交汇点、化解矛盾的切入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回答，让人们通过这

样的理论茅塞顿开，让理论从中展现其应有的魅力和力量。

言之有趣 提升理论传播吸引力

理论之美，既表现在内容的理性之美、真理之美，也表现在表达的感性之美。

理论传播，如果只是当“二传手”搬运“原材料”并不难，难就难在加工和转化。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艾思奇是党的优秀理论家和杰出理论工作者，指出他倡导的思想与时代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哲学与人民相结合的精神，要继续发扬光大。人是追求思想的，也是喜欢生动的。把枯燥的理论讲生动，就要有立体思维，善于在横向上塑造画面感，能够在纵向上彰显时代感。所谓画面感，就是变抽象为具体，化无形为有形。我们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善于借助画面感宣传阐释理论，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把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比喻为“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一个婴儿”。后来，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把调查研究比作“十月怀胎”，解决问题比作“一朝分娩”。陈云的“鸟笼经济”理论，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理论，都给人以清晰的形象性、画面感。所谓时代感，就是紧扣时代脉搏，聚焦新时代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气象，宣传新发展、新成就，宣讲新理论、新经验，宣扬新思路、新办法，结合新媒体新技术的运用，拓展理论传播新渠道新平台，推进主渠道和新阵地的深度融合，推动思想优势叠加传播优势，实现有效传播、深度抵达，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覆盖最大数量和最丰富层次的受众。

“勇立潮头唱大风”。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理论传播者自当珍惜这样的时代，有情怀有担当，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知重负重，能言善言，让理论掌握群众，让群众掌握理论，让真理之光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迸发出磅礴力量。

（作者系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直抵人心的『最后一公里』

□ 梁海磊

在基层面对群众开展理论宣讲，直抵人心是硬道理。这是我30多年基层宣讲的深刻体会，也是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百姓宣讲团”10年坚守、深耕基层理论宣讲的初心。

10年前，为了宣讲阐释中宣部编写的《七个怎么看——理论热点面对面》，由我带领6名宣传干部，经过个人备课、集体试讲后，分赴街道社区和乡村就每一个“怎么看”开展微宣讲。由于“官腔”少、“土味”多，“套话”少、“实话”多，我们的宣讲受到群众的热烈追捧。党的十八大后，宣讲团正式定名为“百姓宣讲团”，从当初的7人发展壮大到今天的120人，每年开展宣讲2000余场（次）。

在基层开展宣讲中，有两件事让我感触很深。第一件事是一位乡镇党委书记请我讲党课，内容让我选定。他说了一件让他生气的事：乡镇所辖的一个村刚选了一位村主任，乡镇党委准备培养他当支部书记。但这位村主任对村庄整治有抵触情绪，理由是少数群众生活习惯不好改。乡镇党委书记多次督查，村容依旧，批评后撂下一句话：“好好想想，你这个村主任是咋当上的。”谁知，村主任狠狠地回了一句：“群众选我的，当然我听群众的！”还嘟囔道：“又不是你党委选的。”书记对我说，他气得两顿没吃饭，让我讲课时点点这事。我翻来覆去想，听课对象是村两委班子。不讲，书记有想法；要讲，怎么讲，讲什么。课上，我从“村官是怎样产生的”破题，讲了3个问题：为啥村主任要让群众选？村主任不是党委选的不该听党委的？听群众的和听党委的矛盾矛盾？中心思想是讲对党负责与对群众负责的统一。这次党课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课后，镇党委书记说他的“气”消了。村主任不仅知道自己错了，还知道错在哪里。话浅理不浅，字简义不简。实践告诉我，基层宣讲的“活力”和“魅力”在于：不回避问题，善解思想扣子。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社区的宣讲现场。社区群众思想活跃喜欢提问，我在社区设计了“宣讲+提问+解答+宣讲”的方式。我用20分钟时间讲主题，话音刚落，有人提问：“当前猪肉价格这么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说实话，这个问题出乎我的意料，但必须回答。我先讲，猪肉涨价是个现实，我国是猪肉消费大国，猪肉价格上涨会使居民生活成本增加。接着给大家解释猪肉价格上涨的原因，然后讲这一问题的解决，要从市场和政府两个层面考虑。我们国家从市场层面和政府层面都有科学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政府利用高效的宏观调控手段弥补市场的失灵与不足。因此，猪肉价格上涨的问题，必然会得到解决，而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这个问题讲清楚了，接下来再讲如何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就顺理成章了。通过这次宣讲，我弄明白了：理论宣讲不仅是“端什么吃什么”的过程，更重要的是“点什么做什么”的过程。勤沟通多互动，才有更多“回头客”。多年来，我们的宣讲都坚持留出互动环节、回答百姓提问。

多年的基层宣讲实践让我深刻体会到，打通理论宣讲直抵人心的“最后一公里”，就要做到“听得到听得进听得懂”，关键要把握好三要三不要。

听得到，就要零距离，不要居高临下。这些年，各级领导干部理论教育的方法途径越来越多，中心组学习、党校培训、宣讲报告会等，但是基层尤其是县以下党员干部，还存在“听不到”的问题，这也是理论宣讲的空白点。解决好距

离问题，就要有“要当先生，先当学生”的胸怀，有人民至上群众至上的情怀，把田野街道当课堂，用群众的呼声做选题。宣讲者在先学一步学深一点的基础上，要经常换位思考，做好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只有和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心贴心，才能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盼，才能使党的创新理论离百姓更近更亲，“飞入寻常百姓家”。

听得进，就要小切口，不要大水漫灌。习近平总书记讲脱贫攻坚不能大水漫灌，理论宣讲也不能大水漫灌。基层宣讲，贵在善于分解，善于提炼，善于细化。切口小，可以以小见大，以微言大义为主旨。题目微，可以见微知著，于细微处见功夫。避免大水漫灌的最好方法，就是抓住广大群众关心的现实问题，特别是热点难点问题，找准解开思想扣子的切入点，把有价值、有说服力的理论送进百姓心坎里。

听得懂，就要接地气，不要夸夸其谈。从某种意义上说，接地气是我们党的好传统，故事接地气，才能触动人心。习近平总书记经常用接地气的百姓话语讲治国理政思想，用“主心骨”比喻我们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核心地位和独特地位，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比喻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用“敲锣打鼓”比喻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的错误思想，等等。这些语言生动贴切、充满人民情怀，能够直抵人心。理论宣讲要做到春风化雨，就要善用百姓语言，讲群众懂得的话，在作风、文风、话风上狠下功夫，不断提高和群众打交道的能力、讲身边故事的能力，在润物无声中宣传引导群众。当然，接地气，不是把宣讲庸俗化。宁可没有掌声，也不哗众取宠，宁可不要喝彩，也不迎合低级趣味。百姓情怀必须有，党课标准不能丢。

（作者系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百姓宣讲团”团长）



话语体系承载着特定的思想价值观念，于理论传播而言，既是载体，也是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做好做强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当代中国呼唤能够体现“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要求理论传播遵循宣传规律，聚焦话语表达，不仅要研究“看法”，更要研究“说法”，钻研叙述方式，做到言之有理、言之有情、言之有物、言之有趣，持续提升理论传播的引领力、影响力、渗透力和吸引力，不断增强广大受众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言之有理 提升理论传播引领力

马克思有句名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理论传播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把透彻的理论讲透彻。

不论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是阐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都要秉持科学、理性的态度，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出发，全面准确把握其中的核心要义，既要讲深，更要讲准。习近平总书记言传身教，总是以话理的彻底性给人以心灵的启迪和思想的力量。他用“撸起袖子加油干”激励昂扬精神状态，让人民群众听得清清楚楚；用“益智补脑”来比喻学习；用“缺钙”“软骨病”来比喻理想信念的缺失；用“玻璃门”“弹簧门”来形容阻碍民间投资的体制障碍；用不能“开小灶”“吃偏饭”来喻指树典型不能搞苗助长；用“墙头草”“推拉门”来描述干部队伍中的好人主义；等等。这些话语，话理精要、思想辩证，一言一语都经得起检视与推敲，以理论的彻底性产生了巨大的威力。

传播马克思主义，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做“布道者”的工作，“布道”首先要“悟道”。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在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掌握精神实质和思想精

髓的基础上，着力讲深讲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讲深讲透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世界意义。只有把“道”贯穿于理论之中，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从学理上深刻揭示、透彻阐释，将基本原理变成深刻道理，才能达到引人入“道”、启人悟“道”的最佳效果。

言之有情 提升理论传播影响力

理论传播想要直通群众的内心，就得先从传播者的内心出发。发乎于心、动之以情，方能情真意切。如果无“心”无“情”，就难以产生情感的涟漪、烙下思想的印记、激发前行的动力。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理论传播者脚下沾有多少泥土，胸中怀有多少真情，广大受众就有多少共鸣。于传播者而言，做到言之有情需要从两个维度来升华：一个是民族情感，这种情怀，既源于对新的历史方位的强烈感知，又源于对民族复兴的殷切向往；既源于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深切感受，又源于对新发展理念的深刻理解；既源于对总体方略的高度认同，又源于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安排的满满信心；既源于维护国家安全的鲜明立场，又源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情怀；既源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鼓作气，又源于建设强大政党的坚定信念。另一个是人民立场，坚持群众路线，俯下身子沉到一线，从基层群众的角度看问题，不是照本宣科、自说自话，而是充分考虑群众感受、听老百姓说话，避免讲者讲得轰轰烈烈、听者感觉与己无关。沉潜到基层了解群众、体验疾苦冷暖，树立“换位思考”的自觉意识，感知群众所思所想，把道理讲到大众的心坎上。只有将心比心，才能换取真心，才能找到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良策。只有真正正站稳立场讲道理，才能切实触动人们的思想和灵魂，让人“解

用“古今中外法”学党史

□ 郭庆松

也才能形成正确党史观。

研究党史是如此，学习党史何尝不是如此。通过“古今中外法”来学习党史，一方面，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明确历史发展的“古今”和由来；另一方面，明了历史发展的“中外”和彼此。学习党史的“古今中外法”，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是全面、系统、科学的正确方法，需要我们遵照执行。

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将当时我们党的历史按照顺序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大革命时期（含准备阶段的1921年至1924年）、内战时期、抗日时期，对各个阶段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等问题进行了相对全面客观具体的分析，这就是他所说的党史研究的“古今法”。毛泽东在提出当时党史发展三个阶段的基础上还深刻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因为“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这是合乎历史发展需要的，也是体现“不能隔断历史”的要求。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学习党史的上述“古今法”，可以帮助我们纵向上深入把握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从横向上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国家、人民、民族、世界作出的伟大贡献，有助于我们把苦难辉煌的过去、日新月异的现在、光明宏大的未来贯通起来，以史为镜、以史明志，走好新时代我们自己的长征路。

毛泽东所说的党史研究的“中外法”，一方面是指字面意义上，“中”就是“中国”，“外”就是“外国”；另一方面是指引中意义上的，有“内外”或“敌我”的意思。前者就是他所说的：“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后者就是他所说的：“借用这个意思，也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运动是‘中’，段祺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外’；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是‘外’。”由此，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共产党、国民党，农民、地主，工

人、资本家和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这就是“中外”。毛泽东在阐述党史研究的“中外法”时还特别提到了党史研究的立场和方法论问题，那就是必须“以我为中心”、一切以中国为中心，而不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为此，他明确指出：“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这也为我们学习党史提供了基本遵循。

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特别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也是学习党史的“中外法”给我们的现实启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



学好党史的关键是遵循正确有效的方法，毛泽东所讲的“古今中外法”为我们提供了重要遵循。

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明确指出：“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毛泽东这里所讲的“古今中外法”，就是党史研究的时间观，就是要站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角度来分析党史、研究党史、看待党史、认识党史，这才是全面的、历史的、科学的、客观的方法，才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正确的历史观，基于此

